

# 寻求秩序与意义的努力

——从平社学人群体建构的原因论及

王现杰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4)

**摘要:** 平社是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团体。平社学人群体的建构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消解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双重危机所作出的又一次探索和努力的结果。这一结果,不仅是淑世情怀和“五四”以来民主科学精神的延续,更是现实政治、社会环境变迁与自由主义理念及群体成员的政治参与意识共同催生的产物。平社的产生透射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如何重构社会秩序和意义世界的思考。然而,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和现实遭遇决定了平社学人的努力又将陷入新的轮回之中。

**关键词:** 平社; 群体建构; 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 K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6-0108-06

近年来,在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研究中,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的团体——平社,正逐步浮出水面,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历史的复原。以往有关平社的研究与发掘<sup>[1-2]</sup>,学界专论有限且多着眼于平社的“费边”色彩,或仅限于论著中旁及平社群体,往往失之于略,语焉不详,诸多细节尚待梳理和厘清。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着眼于平社群体建构的社会历史因素,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的努力进行探讨。

## 一、儒家淑世精神是平社学人寻求秩序和意义的动力

近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从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前启后的“转型时代”<sup>[3]</sup>,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它不仅仅带来了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而且面临着道德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如何应对这两个危机,重构社会秩序和意义世界,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不单是转型时期知识分子所思考的问题;并由此出发,形成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探寻的基本命题。

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解体,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传统的文人失去了仕进的阶梯,导致“内圣外王”的人生价值逻辑无法得以展开。这样,他们既丧失了个人安身立命的处所,也使得往圣先贤的理想社会无从落实,最终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社会和人格发展的方向感。然而,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儒家先哲仍在有意无意之间影响着他们的人生取向。诸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话语中所昭示的淑世精神,既是儒家意识形态下人的生命价值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种“积极入世”情怀的映照。虽世易时移,追慕一个理想的社会与人格,对于近现代知识分子——尽管

收稿日期: 2007-12-09

作者简介: 王现杰(1971-),男,广西梧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近代史

经历了欧风美雨的吹打——仍然是个人获得生命和宇宙永恒意义的路径。因而，在国家和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之时，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掌握丰富文化资源的先进知识分子，总是以一种“书生报国”的热忱，企图通过不同的途径去重建社会“重心”，重构社会秩序。平社学人正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罗隆基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曾与闻一多、潘光旦、吴景超等人组织了一个“大江会”，在罗隆基主稿的“大江会”宣言里面有这样的字句：“我中华民族爱和平，我中华民族更爱人道，我中华民族主亲善，我中华民族主正义。为人道而奋斗，我们不惜杀身以成仁，为正义而拒争，我们不惜舍身而取义。先国家而后一切，舍国家外愿牺牲一切，以求中华民族之自由独立与统一，是则我辈之所愿也。”<sup>[4]</sup>另外，胡适说到：“但是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sup>[5]</sup>徐志摩在赴美国留学途中也写下这样的字句：“况今日之世，内忧外患，……而今日之事，吾属青年实负其责。”<sup>[6]</sup>从这些言语片断中不难看出“铁肩担道义”的使命感，而这种使命感恰恰是绵延不绝的淑世精神的延伸。只是在新的时代，他们又赋予“理想的社会与人格”以新的色彩，增添新的具体的涵义。民主与科学，就是“五四”以来，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为挽救危亡、重构秩序和意义所开出的一剂“方药”。他们相信，民主、自由、平等这些现代价值是拟重建的正义秩序的内在必然；西方的科学与理性则可以解决信仰的问题，成为一种最可靠的人生观，从而提供给现代人一个确定不移的意义世界。

## 二、自由主义理念是平社群体认同的价值前提

首先，平社学人对自由主义理念的认同来自于他们长期以来所接受的教育。平社成员大多是留学英美的学者，长期的游学生涯，浸润于民主与科学的社会氛围，使得这些人深受英美的社会氛围和业师的影响。胡适留美七年，在其人生性格和志业定型期受业于杜威，深受后者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杜威认为：“国家依然重要……但它的重要逐渐蕴蓄于培养和调护自由结合的活动的力量里面。只在名义上它在现代社会里是其他诸社会组织所为而存在的目的，增进人所共有的种种善的团体才成为真正的社会单位。……凡把价值本身贡奉于人生的人力的结合就因此具有本身独一至上的价值。”<sup>[7]</sup>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国家和社会固然重要，但它们存在的目的并不是其自身，而是为了培养和调护个人的自由。杜威关于个人、社会、国家三者关系的这种认识对胡适有着重要的影响。胡适在向青年人介绍自己的人生观时，他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sup>[8]</sup>这种基于个人主义学理的自由主义观念，与胡适反对独裁专政、要求推行民主政治、实现宪政的主张是密切联系的。此外，曾受业于英国费边主义理论家拉斯基的平社学人有罗隆基、徐志摩、王造时等人。而这一时期拉斯基的政治学说是偏重于自由主义的，其中含有不少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因子”<sup>[2]</sup>。再者，平社学人相当一部分是清华校友<sup>[9]</sup>，这也是他们拥有共同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当时，清华的入学规定是“考生年龄以不超过十四岁为限”。清华的学习时间通常是八年，之后绝大部分学子留学欧美继续深造。不难想见，在这样的“留美预备学校”接受长达八年的西方文化系统教育，自由和民主观念，当然成为大部分清华学子的重要学养。

其次，平社学人对自由主义理念的认同，还来自于他们对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工具合理性”的期待。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眼里，西方自由主义理念是被当作达到某种合理目的——重构社会秩序和意义世界——的工具和手段来使用的。近代以来，面对中国社会秩序的失范和意义世界的崩溃，不少仁人志士先后提出不同的方案，以期消解秩序与意义层面的双重危机。在这些方

案中,既有企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资源的,也有向西方思想武器库中借用工具的。自由主义就是从西方思想武器库中借来的一件锐利武器,它希望借理性与科学以解决意义危机,用自由和民主来消解秩序危机。平社学人所尊奉的自由主义思想不是具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早期自由主义,而是修正了的自由主义。他们认为,民主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自由应该是个人能力的最大限度的发挥,并竭力提倡个人对公众事务与社会福利的关心与参与。而儒家传统的社会理论强调的是专制等级制度,以及专制等级制度中的相对社会地位,注重的是维持社会平衡,注重维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等级差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正是这种维系等级、名分的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束缚了个人能力的发挥,阻碍了社会国家的改良与进步。他们认为“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那种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sup>[10]</sup>。而挽救危亡重建秩序当有赖于更广泛的民众参与政治社会生活,也有赖于以个人责任感增强为基础的“民族”觉悟的提高。因而,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自由主义理念,就成为自由主义者达到合理目的的行动工具,即期望以自由主义为工具,重建社会秩序与意义世界。

### 三、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状况是平社学人聚集的社会因素

北洋政权的覆灭、国民政府的初创曾给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以某种程度的希望<sup>[11]</sup>,他们一度相信国民党有能力成为社会的重心、重构社会秩序。但是,这种希望很快烟消云散。

随着南京政府军事斗争的胜利,国民党逐渐加强了一党专政。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72次中央常会通过了《训政纲领》,并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训政纲领》指出:(1)“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2)中国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国民政府总揽执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3)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并修正解释国民政府组织法<sup>[12]</sup>。1929年3月21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中又规定:由“国民党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中国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sup>[13]</sup>。不难看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就是国民党独自掌握政权、治权,既没有人民民主,也没有民选的议会,更不允许其它党派的合法存在。面对日益沉闷的空气,平社学人对社会秩序得以重新确立的希望化为泡影,这一切不能不激起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反抗,而他们的反抗又与其所受的自由主义理念的熏陶与以及“书生意气”相契合——强调以一种温和的、非暴力的“议政”方式来践行,平社的出现也就成了合乎逻辑的结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平社学人之所以聚集于上海,更有其具体原因。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由于特殊的政治格局,租界当局和华界当局对于思想文化的禁忌各有不同,采取的措施和行动也不尽一致。这种能够文化控制的错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上海比之中国其他地方有着相对宽松活跃的思想文化空间<sup>[14]</sup>。加之上海文化事业的发达,更使上海具有为其他地方所不及的独特的文化环境。在现代社会,游离于传统的乡土社会而寄身于都市之中的新式知识分子,由于缺乏传统的自然关系实现相互认同进而整合为某种群体,因此,他们需要按照一种新的规则来寻求相互之间的交往与认同。“这种新规则,不再是寻找共同的历史根源感,而是取决于多元复杂的公共

空间……这些空间主要是沙龙、同人刊物、公共媒体、大学、社团等等”<sup>[15]</sup>。20年代末上海文化事业的发达，无疑为新型知识分子的认同与交往提供了一定的平台。首先，当时的上海集中了国内绝大多数的传媒和出版等现代文化机构，全国最大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和开明书局等，均设在上海。其次，当时上海的出版物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有很大的增长。据统计<sup>[14][252]</sup>，1920年商务印书馆的出书量为1284种；众多期刊在上海出版发行，包括《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著名刊物。另外，上海拥有一批新式的大学如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等。总之，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与文化氛围，以及众多报刊、大学的创办，为文化人士提供了栖身之地，为平社学人拓展了“论述空间”，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构建了批判新政府的平台。当社会局势不足以激发他们暂时消沉的政治热情时，也不妨碍他们谈“风”论“月”<sup>①</sup>；一旦情势做需，热情复炽，他们便很自然地走到一起，进行“书生论政”式的社会与政治批判。

总而言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变迁，直接催生了平社这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团体。

#### 四、对平社学人重建社会秩序和意义世界的文化判断

梳理平社学人群体的建构过程，我们不难看到，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消解近代中国社会秩序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双重危机所做的探索和努力，也使我们对平社学人的思想努力，有了一些更深刻的历史认识和文化判断。

##### （一）平社的产生透射出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重构秩序的思考

如前所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不久就开始加强一党专政、实行“党化政治”。一方面开始针对共产党的“清党”运动，导致大量的青年学生在此运动中丧生，被中外人士认为是可怕的“白色恐怖”。另一方面，以暴力手段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对各种言论进行箝制以加强统治。平社的产生，正是中国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思考改造中国社会路径，即如何重建社会秩序的产物，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出于对国民党“党化政治”的不满，在新政权的框架下进行的思想文化抗争。当然，无论是共产党的“以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还是国民党的“党化”政治，都与自由主义者温和、渐进手段进行社会改良的途径相违背及其对“自由、民主”的认知相去甚远。但是，历史地看，“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寻求中国社会秩序和意义的道路上，曾有过共同的追求与文化借鉴。可以说，这两大思想流派的基本主张“不仅不是截然对立，甚至可以相互会通之处”<sup>[16]</sup>。二者都主张以自由、民主、科学等去重构中国社会的秩序与意义，达到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理想社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曾在不同的场合，宣扬民主、自由、宪政等观念：“盖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吾人苟欲为幸福之立宪国民，当先求善良之宪法；苟欲求善良之宪法，当先求宪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sup>[17]</sup>“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吾目所见者，皆Democracy战胜之旗，耳所闻者，皆Democracy凯旋之声。吾不暇为失败之Pan...ism哀，吾但愿为胜利之Democracy祝！”<sup>[18]</sup>胡适也曾承认，唯物史观包含“部分真理”，并坚持“各行其是，各司其事”；“分工并进，殊途同归”<sup>[19]</sup>。只不过，随着20年代中国政治氛围的日渐激进，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sup>[20]</sup>。特别是1926年左右，两湖地区工农运动中的一些“过火”行动，让自由主

① 从徐志摩《新月的态度》一文中可见一斑，文中提出以“健康”与“尊严”二个抽象的概念作为文艺创作的原则，是一种远离人世纷争的态度。

义知识分子们难以接受,使得他们在改造中国社会问题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和看法,并最终导致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道扬镳。

## (二) 平社群体聚散匆匆的内在逻辑

首先,平社学人对理性、自由、民主等价值的倡导,是把它们作为不证自明的“常识”来看待的,并没有对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进行学理的探讨,因而也无法认知其内在张力。作为自由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自由理性主义认为,“社会科学中的知识必须限于可由经验证实的范围,而不探讨其后的本质或形而上学的深层”<sup>[21]</sup>。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对社会秩序背后的意义世界是抱着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因而他们无法解构中国传统的天尊地卑、由中心而边缘的宇宙观和天人合一的价值观。然而,问题恰恰也就在这里。不对社会秩序背后的意义世界进行价值判断,不对在中国文化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天尊地卑、由中心而边缘的宇宙观和天人合一的价值观进行解构,实际上也就无法重构新的意义世界,从根本上消解中国社会在意义层面的危机。意义的寻求,是建立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环节,缺乏意义准则的支撑,平社学人寻求秩序的努力只能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努力”。

其次,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其基本信条是,每个人是其自身利益以及如何促进这些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此,个人主义对权威、对控制个人的种种方式,表示了怀疑和否定。这也种下了平社群体曲终人散的因子。平社是以《新月》杂志为思想宣传和社会活动平台的,《新月》的创办,最初拟定胡适为负责人,徐志摩主编,却未料梁实秋、闻一多等人提出异议,认为刊物不应该由一、二人独断专行,应该更民主化,由大家共同商议。然而,更民主化的结果是,刊物办起来以后实际面临无人支撑的困窘,常常只有一、二人真正对此负责,其他人只是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当群体成员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时,难免导致“劳燕分飞”<sup>[22]</sup>。由是观之,平社群体必然是聚也匆匆,散也匆匆。

最后,平社学人以自由主义相标榜,以理性、妥协的方式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种种问题进行讨论,其中主张不能说完全无补于社会,但却未能切中问题背后的关键——近代中国社会,广大劳苦大众对统治者的任何社会改造措施都失去了希望。这种失望不是就政府实施的某个具体方案而言的,而是整体性的失望。这使得民众采取了不与统治者合作而与之对抗的姿态。在这种上下严重离心、无法实行社会整合的情况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种在维持现政权的前提下进行“渐进的、逐步的改良”的呼号,自然显得曲高和寡、应者寥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一次聚集起来以“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对新政权展开批评,这正是他们寻求秩序和意义的努力的体现。但是这种努力既游离于广大民众之外,实质上又是在旧的社会框架内进行的,在政治重压之下,注定它将只能重新陷入新的“轮回”之中。

平社与中国现代史上的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团体一样,就像是历史夜空中划过的流星,曾带来刹那间的一丝光亮,却无法照亮整个夜空。

## 参考文献

- [1] 沈卫威. 中国式的“费边社”议政: 胡适与“平社”的一段史实[J]. 史学月刊, 1996, (2): 71-75.
- [2] 卢毅. 平社与费边渊源初探[J]. 学术研究, 2002, (3): 74-79.
- [3] 张灏.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J]. 二十一世纪, 1999, (4): 29-39.
- [4] 谢泳. 罗隆基: 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10.
- [5] 胡适. 胡适的自传[C] // 欧阳哲生. 胡适文集: 第3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10.
- [6] 徐志摩. 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C] // 徐志摩. 徐志摩全集: 补编3.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 8-11.

- [7] [美]杜威. 哲学的改造[M]. 许崇清,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8: 109-110.
- [8] 胡适.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C] // 欧阳哲生. 胡适文集: 第5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511.
- [9] 闻黎明. 闻一多传[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77.
- [10] 胡适. 易卜生主义[C] // 欧阳哲生. 胡适文集: 第2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487.
- [11] 罗志田. 知识分子与革命: 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C] // 耿云志. 胡适评传.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68-115.
- [12] 魏宏运.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 第3册[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552-553.
- [13]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 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C] // 夏新华, 胡旭晟. 近代中国宪政历程: 史料荟萃.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804-805.
- [14] 熊月之. 上海通史: 第10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15] 许纪霖. 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J]. 天津社会科学, 2004, (3): 123-134.
- [16] 朱高正.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互动[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 (6): 47-61.
- [17] 李大钊. 宪法与思想自由[C] //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228-234.
- [18] 李大钊. Pan...ism之失败与 Democracy之胜利[C] //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244-247.
- [19] 胡适. 关于《我们的主张》的讨论[N]. 努力周报, 1922-05-28(01).
- [20] 张太原. 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J]. 历史研究, 2000, (4): 55-75.
- [21] 顾肃. 自由主义基本理念[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6.
- [22] 梁实秋. 忆新月[C] // 梁实秋. 中国新文学丛刊: 梁实秋自选集.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1: 313-325.

## Struggle for Order and Meaning

### —— On Construction Reason of Pingshe Group

WANG Xianjie

(College of History and Touris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China 541004)

**Abstract:** Pingshe, a group of liberal intellectuals in 1920s, derives from research and struggle that the Chinese liberal intellectuals made to clear up the double crises in social politics and culture layers in modern China. Pingshe was not only the continuity of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and science since May-fourth, but also the common product of actual politic, social circumstance vicissitude, liberalism idea and the sens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colony members. Pingshe promulgated that the Chinese liberal intellectual was pondering on reforming the social order and the meaningful world. But the inner contradiction and the actual encounter determined that the struggle of Pingshe would plunge into a new “samsara” again.

**Key words:** Pingshe; Group construction; Liberalism

(编辑: 杨峰)